贾平凹：当起“小编”，为“疫”线战士加油

本报记者杨一苗 强晓玲

在我的故乡大兴安岭，庚子年的春节与以往的春节似乎没什么不同，含有福禄寿喜字样的春联，依然在门楣左右对称地做着千家万户的守护神……但今年的春节又与以往有所不同，拜年串亲戚的少了，聚餐聚会的少了，外出佩戴口罩的人多了，围聚在电视机前关注疫情动态的人多了。

是的，去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像一条不断拉伸的毒蛇，已蔓延至全国。当太阳在蒙着霜雪的玻璃窗后冉冉升起时，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看疫情动态，看到雄鸡版图上深红颜色范围逐日扩大，警报一声比一声急，我的心阵阵作痛。

——《春花依然会盛开》迟子建（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年过成这样，历史上大概也少有。我们赶上了。惶恐、抓瞎、捉急。最大的动作，就是远离疫情、“疫人”……而就在这时，有一个群体，却在悄然集结、整队、出发。他们就是医者。一种只是掌握了一门与我们普通人不同技术的生命。

我看到里面很多还是孩子。也许比我女儿还小……驮着比他们身躯粗壮几倍的“辎重”，出发了……我相信这些初始上阵的孩子，不会跟“大匠”钟南山、李兰娟们一样，都拿捏有度，淡定如山。他们会同我女儿一般，面对不可知的黑夜，毛发倒竖，小腿微颤。但他们还是去了——武汉！这是一个眼下与疾病、死亡紧密相连的去处，那个“九省通衢”“东方芝加哥”……今天，他们是去作战。

——《大爱医者》陈彦（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几十例，几百例，上千例，数据不断攀升，像是开发互联网产品进行的灰度测试。比灰度测试更可怕的是，下一个是谁，什么时间，程度怎样，结果如何，扩大到多大范围，谁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是院士、教授、博导、医院院长、医生、护士、工程师、董事长、警察、画家、诗人、导演、飞行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长江救人者、出租车司机、健美冠军、农民、工人兄弟，是爸爸、奶奶、爸爸、妈妈，是孝顺的儿女、乖巧的孩子，是我的老师、学长、熟人、同乡，同学的朋友、朋友的同学。看着那一个个在猝不及防中倒下的身影，我一阵阵地心疼。心有时候是会疼得落泪，甚至会滴血的。

——《人类，从血泊中站起》刘汉俊（中宣部“学习强国”总编辑）

这些文字来自正在组稿的《共同战“疫”》专刊，他们的作者大多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以及全国众多受邀的知名作家。

“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正经受着这次大灾难而奋起抗疫。武汉是主战场，全国每一个人都是战斗员。当我们在经受大灾难的时刻，都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生与还、健康与病痛、不安与恐惧的问题。”大疫当前，亲自担任《共同战“疫”》专刊主编的著名作家贾平凹撰文写道。

他说：“作为一个作家，能做什么呢？就是记录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自己写文章或者电话联路，组织更多的作家写文章，为这个国家呐喊，为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工作人员加油。”

3月5日，著名作家贾平凹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专访时表示，此次邀请全国知名作家撰稿参与《共同战“疫”》，就是要用作家的视角，以记录的形式“抒写抗击疫情中平凡人的不平凡，以及引发的深刻思考。”

草地：在过去的五十多天里，您是以怎样的心情及视角看待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仍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

贾平凹：我没有经历过战争。我是以战争看这次疫情的。

因为对疫情没有准备，它突如其来，又是那样的忽然暴发，我们初期不免有仓皇、慌乱，如同二战时希特勒打到莫斯科城下。

但是我们很快镇静下来，从上至下，四面八方，万众一心，以武汉，湖北为主战场，全国人人都是战斗员，奋起抗疫。其动员力，其战斗力，是强大的。

在这期间，凡是看到电视里有唱国歌时，我眼睛潮湿。

危难时期，深感国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团结。

草地：封闭在家的日子，您都做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以作家专刊的形式来记录这次疫情？

贾平凹：疫情蔓延时，武汉封城，西安也是小区封闭。我因在春节前感冒，独自在另一处隔离。

每天看电视和手机新闻，当看到武汉、湖北每天都发生着那么悲痛的事，有那么多悲痛的人。同胞受难，全国一些省市的医务工作者开始一批批赶赴武汉、湖北。我就想，我们居家隔离的人能做些什么，作为作家又能做些什么？

我和穆涛（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通电话，决定编辑战“疫”专刊，与国内的作家联系，让大家拿起笔写文章，为我们国家呐喊，为第一线的医护和所有工作人员加油。

编辑部的同事热情很高，都行动起来。我们的力量有限，能做的事微乎其微，但我们只能做这些，权当像战争年代后方给前线的战士寄一封信或一张照片，我们在尽力做我们能做的。

草地：这个“专刊”从开始至今，有多少作家响应？目前，来稿情况怎样？作为主编，您认为这些作品中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贾平凹：我们联系到的作家没有谁推辞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写了，没写的满口答应就动笔写，更有好多作家知道了我们在编专辑，主动和我们联系，把稿子传寄了来。

现在，光获得茅奖、鲁奖的作家就有十多位。他们以他们的具体情况，以他们的感受，以他们的视角来写。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家国情怀，是他们的真诚大爱，以及对人与自然、生与死、善与恶诸多方面的思考。

草地：疫情面前，您认为当代作家最应该做些什么？

贾平凹：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去完成自己重要的作品，但大的灾难到来，**非常时期，应该发声，这是为文的责任和做人的良知。**

草地：作为著名作家，参与主编《共同战“疫”》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

贾平凹：《美文》是在我手里创办的，1992年创刊。那时条件差人手少，创刊的那几期，我得出去组稿，写发刊词，编稿，甚至自己搞封面设计。前十多年每期还在写“读稿人语”，慢慢就让穆涛去负责担沉了。《共同战“疫”》将在《美文》出一本专刊，再集结成书。

在战“疫”中，全国的作家几乎都在写东西吧，也有相当多的报刊同我们一样在组织出刊出书。我想，这些书刊现在是为国家呐喊，为武汉、湖北加油的一种声音，将来会为历史存留一份记录。

草地：未来您还有什么相关的计划，您正在创作的最新作品情况是什么？

贾平凹：我正在写一部小长篇，这里就不谈了。

毕淑敏：我希望，《花冠病毒》永远只是预言

本报记者强晓玲 张漫子

“20NN年3月。一种来历不明的病原体强烈袭击燕市，初步命名为花冠病毒。主要症状是发烧、咳嗽、血痰、腹泻，全身各系统崩溃。罹患人数达数千，死亡病例累计已数百。”

“医院里报病危的重症感染者俯拾皆是，死亡势不可当。给普通民众心理造成极大冲击，恐慌悲观情绪蔓延。”

“瘟疫骤起，如果你一直待在家里，会感觉到并没那么危险。家还是原来的家，小环境仍保持稳定。走在大街上，会深刻感到瘟疫剿灭了人们所有的娱乐，取消了工作的快感。”

……

2020年元月，新冠肺炎袭击武汉，一切都来得那么措手不及。今年2月初，面对确诊人数的不断飙升，有网友评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作家毕淑敏在2012年出版的小说《花冠病毒》中描述的是那么的相似，“突发瘟疫、城市封锁、民众出逃、抢购成风……这本小说像是一则‘预言’。”

在小说的序言中，毕淑敏说，“这本书里，渗透我人生的结晶……包含我对以往和将来世界的回眸与眺望。包含着我对宇宙的好奇和幻念。”

2003年，“非典”暴发。作家毕淑敏因为当过医生当过兵，被中国作协选中参加特别采访组，开赴“非典”第一线。她走访抗击“非典”的一线医生护士，从“非典”中恢复过来的病人，包括外交部、国家气象局等部门，结合自己的经历，酝酿沉淀了八年，于2012年写出《花冠病毒》。

“这些天，问候的朋友很多，大家都同时问到一个问题，‘八年前是如何预言的？’”日前，深居北京的著名作家毕淑敏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副刊记者专访，她说：**“我希望它永远只是预言，而非重现。”**

毕淑敏说，如果产生灾难的土壤依然存在，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且很可能一战再战。“我坚信这次瘟疫一定会过去，我们一定能胜利。不过，要痛定思痛，要亡羊补牢。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惨重了。”

听到“人传人”的消息，我痛不欲生：魔盒打开了

草地：此次疫情发生后，您写道，“清楚记得，当听到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人传人’的信息时，顿觉五雷轰顶，肝胆俱颤……”那一刻，您在做什么？这一消息从何处传来？当时您的第一反应、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毕淑敏：我是从新闻里听到钟南山院士这个说法的。武汉有不明原因肺炎出现后，我一直特别关心“人传人”这个问题。“非典”中的经验，这是病毒得以收割更多性命的必杀技。**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痛不欲生地想到：魔盒打开了。**

草地：得知疫情至今的几十天，您是如何度过的？做了哪些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事？

毕淑敏：记得我连春晚都没看完就睡下了。完整的安稳睡眠，对身体免疫力很重要。大年初一吃的是速冻饺子。买菜需外出，尽量减免。

基本生活便成了：

一，听新闻。了解整个疫情形势的变化，明白此时应该做什么。

二，配合社区的各项安排，遵纪守法。

三，与家人和朋友们保持密切联系，互相鼓励。

四，维持基本生活规律。因已是新冠肺炎高危人群，年龄大有基础病。不给社会添负担，不给子女惹麻烦。

五，做口罩。从网上买了熔喷无纺布的边角料，自力更生做口罩，以解家中无口罩可用的困难。

六，继续写长篇小说。

七，读书。

草地：经历过17年前的“非典”，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毕淑敏：经历了“非典”之后八年，我写了长篇小说《花冠病毒》。这是我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

写完之后，就漫游世界去了。我从“非典”中，感受到人类如此脆弱和世界如此密切相连。我想，我已经老了，再不抓紧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可能来不及了。

从那时到现在，我大约走过了几十个国家，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和启示。我写了一些游记，比如“非洲三万里”“美洲小宇宙”“破冰北极点”“南极之南”“巴尔干的铜钥匙”等等，期望和更多的朋友分享这些见闻与体会。

草地：有作家谈到，“相隔17年，在灾难面前，人类表现出了相似性——动员力、应对力、治理力、救助力、合作力、创造力、健忘……2003年时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17年后卷土重来。我们都不想等到下一个、两个、三个17年时，人类就这样永远重蹈覆辙下去……”或许，这也是您时隔8年完成堪称“预言”的科幻小说《花冠病毒》时，其中一个初衷或心愿？

毕淑敏：您说的很对。当初，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思虑和惊惧，开始了《花冠病毒》的写作。

它在我的所有小说中，原本是反应最平淡的一本。

我一共写了5部长篇小说，首部《红处方》多次加印，并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血玲珑》也是这样。《拯救乳房》（这个书名不是我起的），引起了轩然大波。《女心理师》加印了很多次，也正在拍摄电视剧……只有《花冠病毒》，出版后，悄无声息，再无加印。

我对这个反应有心理准备。国人多健忘，心存侥幸，以为灾难远去，不屑回首。

我曾设想：或许我死后多少年，瘟疫再次大流行。也许有人会从尘封的角落找到这本书，发现有人多年前曾竭力发出过警示。那时，我早已逝去。只能身处天堂，为人类垂泪。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仅仅过了17年，瘟疫又一次卷地而来。

这一次，涉及面更广，死亡人数更多。

受命亲临“非典”一线采访，写《花冠病毒》希望竭力防范悲剧重演

草地：您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并受命亲临救治一线实地采访。可否谈谈那段封闭隔离经历的感受，以及在采访过程中最触动您的事情？

毕淑敏：触动我的事儿很多，记忆最深刻的是——一线的医生护士会告诉我，他们能看出来哪床的病人死亡可能性会比较高。我起初以为判断基于医学角度，比如谁更病重、年龄更大或者有基础病。但他们对我说，就算这些客观因素大致相同，但病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会导致生命的不同归宿。

简言之，能战胜病魔、活下来的概率更大的，是那些对生命抱有积极看法、努力接受医疗、求生本能强烈、绝不轻易言败的病患。

包括这一次和新冠肺炎的斗争，你在电视里也可看到，很多康复者都在说：信心非常重要，心态一定要好。

好心态从哪里来？

假若你得了重病，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平日积攒下来的心理能量，就会成为你极为重要的生命支撑点。你若一贯消极，到了病入膏肓时再虚弱地给自己打气，很可能见效甚微。

所以，我们平时就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建设，磨炼出在困难时刻镇定、勇敢、合作、不气馁、不轻言放弃的顽强斗志。这在和瘟疫做斗争的紧要时刻，非常重要。

我采访过很多医生护士，如果在私下场合见到他们，我认不出他们。我没有看到过他们完整的脸，但我记得他们的声音，记得他们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

草地：《花冠病毒》一书是您在经历2003年“非典”一线采访后，时隔8年才动笔的作品，我们想知道，您当时的所思所想，以及创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为何迟迟动笔，这期间您做了哪些思考，创作想法发生过怎样的改变？

毕淑敏：在面对雅典人即将处死自己时，苏格拉底向所有人宣告，“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

审视是个动词。意思是——仔细地看，反复分析。

我想借用一下。未经审视的疫情资料，也是不值得写的。这是我在深入一线，采访了“非典”方方面面，积攒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对自己说的话。

审视之所以重要，在于提供思考路径和方式。它要求人们自己对自己提问，以找到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甚至觉得理所当然的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罪恶的邪祟与愚蠢的蒙昧。

我需要时间，需要思考，甚至需要梦境的参与。那个时段，我读了大量的书，做了很久的功课。在梦中，我无数次梦到过病毒，它们邪恶而艳丽，摇曳多姿。

“非典”后，我在理智层面上，判定瘟疫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如果说“非典”的发生和离去，有些人乐观地以为这只是偶然和意外，我觉得就大错特错了。

通过对非典全过程的回忆和思考，加上大量阅读人类进化史和病毒学等资料，让我心中充满深深的忧虑。我写《花冠病毒》这部小说，将我的思考镶嵌在其中的故事里，希望能传达给更多人以生物危机意识，起到警醒作用，竭尽全力防范悲剧重演。

病毒没有知觉，没有头脑。但作为这颗星球上最高等的生灵，人类是有良知和理智的。病毒在变异，人类在进化。人类绝非万能，病毒也不会自动停止对人类的侵袭。对病毒，不要扰动它，不要逼它跑出原有的栖息地，不要将它原来的宿主赶尽杀绝，不要让它突破多少万年以来“井水不犯河水”的生存界限。一旦它变异后冲出江湖，人类在交战初期，完全缺乏抵抗手段。病毒为刀俎人为鱼肉，形势将非常不利于人类，大规模的染病和死亡几乎会成定局。

病毒无法斩尽杀绝。根据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最新报告，已分类病毒近5000种。这还不包括未被分类的大量新病毒。你除了找到与它和平相处的平衡点，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草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久，不少学者推荐了您的这本《花冠病毒》，认为这本写于八年前的书有预言性质，我们留意到不少读者也重新翻出来再度阅读，您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价值？

毕淑敏：国家大危难中，《花冠病毒》被翻出阅读。人们说我是神算，甚至问我是否有特异功能。我除了一腔热血一支笔，无任何异稟。

有读者对我说，请记住，在危险中能让人念念不忘的人和事，通常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会想起人民子弟兵、白衣天使、吹哨人、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志愿者……你的这部小说能被人再次讨论，是值得庆幸的。我说，当年是中国作协派遣我亲赴一线，这只是不辱使命。

在二手书市场，这部八年前的旧作，已经炒到了几百元一本。最近有家出版社正在紧急加印《花冠病毒》，预计很快就能上市。

草地：听说在此次抗疫中，中医药起了不小的作用，您此前在小说中也多次提及中医药在与病毒的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此次疫情中，您如何看待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和价值？

毕淑敏：中医药曾帮助中国人民走过了无比漫长艰辛的发展史，它的宝贵价值有目共睹。我对中医药充满了尊敬和信心，还有期望。

西医认识新的疾病，一上来就从微观着手，比如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忙着研究生产出针对其中某个环节的药物，包括研发疫苗。

中医药则以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辨证施治，着重调整人的全身抗病能力。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方法，都值得期待。

草地：《花冠病毒》被誉为中国首部心理能量小说。作为曾经的医生、心理治疗医师，您在小说自序中写道，“在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就像本书中出现的那种极端困厄情况，最终能依靠的必是你的心理能量。”请问疫情当下，普通人除了保持良好心态、敬畏之心外，还能做些什么？

毕淑敏：大疫当前，一定要保持坚定信心和良好情绪，多进行正面积极的思维，让自己的心理能量温暖饱满，它和药物治疗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要有永不放弃的信念。

手机里的信息源源不断，真假难辨。很多信息是假的，但被转发重复的次数多了，人们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恐慌由此产生，情绪趋向紧张。应对之法是心态镇定，要有眼光，有甄别意识，不接受来源不明的信息恐吓。如果实在无法识别信息真伪，可坚决封闭它。

每天收听收看新闻广播，静心多读书，我指的是正规出版的纸质书。这种古老的仪式感，会让你的情绪安稳下来，格局变大一些。

说到选书的种类，我倾向选择历史类图书，它能让人的眼光从日常的苟且伸展到历史的辉煌纵深处。其次，人物传记和旅游方面的书，也可酌情一看。你会发现即使是伟人，一生也绝非一帆风顺，一定遭遇过挫败与苦难。看看旅游方面的书和画册，或欣赏电脑上的美丽风光图片，也可增强空间的纵深感，让人成功地转移注意力。至于追剧，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只是选择上要稍加区分，多取积极阳光的类型。太悲苦诡异的，免。

病毒远远比人类更为古老，战胜病毒最有可能的方向——平衡

草地：比尔·盖茨曾说过，“未来，流行病是比核武器更大的威胁”。您觉得人类在与这个无形敌人的战斗中该怎么做？

毕淑敏：病毒远远比人类更为古老。如果一定非要说谁是地球主人，病毒比我们更有资格。病毒肆虐，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异？为何从原来的状态夺门而出，疯狂地染指人类？我们如何与大自然的各种生物和平共处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不然的话，灾难骤起时，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灾难离开时，我们也不清楚它因何而去。我们更不知道的是——下一次它会不会再来？人类生活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中。

病毒是地球上最后的敌人这个说法，振聋发聩。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原子弹（它有可能被控制住而不被引爆），不是饥饿与贫穷（这些可以经过不懈努力加以改善和消除），而是如何与病毒相处（人类现在几乎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你无以逃遁。

战胜病毒最有可能的方向是——平衡。根据现有不完全统计和估算，世界上已分类的植物是31万种，加上动物和真菌，超过了190万种。预计最终统计数字，或将超过1000万种。这么庞大的阵营，人类必须要与它们友好相处。不仅仅是为了让那些物种有繁衍生息的权利，也是为了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长治久安。

人类在物种进化的最高宝座之上，所以负有更大的责任。你不能凭借有利地位大肆杀戮，那是人类沙文主义，必将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草地：您在《花冠病毒》序言说，“人类与病毒必有一战”，这句话背后更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看待人类与病毒的长期共处？

毕淑敏：从艾滋病毒开始，我们遭遇“非典”、尼帕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等等。这些新出现的传染病，病源基本上都来自野生动物。一些原本与人类有距离的病毒，从原来的宿主身上跑出来，通过某种方式侵袭人体。在适应了人类环境后，变成能够直接在人际间传播的超级杀手。

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基本上也可以肯定是一种野生动物源性病毒。看到华南海鲜市场大肆售卖野生动物的图片，令人惊愕恐惧。

我在想，除了武汉，中国还有哪些城市曾有过这样的市场？没看到相关的反思和检讨，但我相信一定是有的。也许华南海鲜市场并不是新冠病毒的第一来源地，但它起了重要的二传手的作用，应该无疑问。

人和动物要长期相处，就会要和它们身上的病毒长期相处。这不言而喻。

草地：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把握？

毕淑敏：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有其历史演变过程。猎杀野生动物，曾是人类生存下去并获取足够蛋白质的基本保证，“食肉寝皮”即为那个时代的写照。大而凶猛的野生动物，更是对人类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古人若是逃跑不及，就要拼死搏杀，以求保命。

进入农耕时代后，人类食物来源日益多样化，并把一些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禽家畜，丰富了营养的来源。至于防身，除非野生动物不与人类照面，否则还是要奉行格杀勿论策略。比如中国故事中的“武松打虎”“东郭先生和狼”，外国故事中的“农夫和蛇”等，表述和传递的仍是持续的杀戮信息。

现代社会则不同了，一是野生动物在人类捕杀和环境气候变化下，数量大规模减少，很多成了“弱势群体”，对人类已不再构成生存威胁。然而它们身上寄居了亿万年的病毒和细菌，由于宿主生存条件的变化，开始奔逸而出，四处游荡泛滥，大有将人类变成自己终宿主之一的危险趋势。

从“非典”到新冠的17年中，我们的科技有了巨大的进步，人人皆知。不过也有丝毫没改变的部分，那就是人的生命依然脆弱，人性的幽暗依然存在。当然，勇敢和无私忘我的精神，也光辉灿烂。区区17年，没法让人的机体进化出对新病毒有针对性的抵抗力。所以，战斗正未有穷期。

人类和地球上的万物必须和谐相处。不然，被杀戮的不仅仅是它们，最后的屠刀会像古老的土著武器“飞去来”一样，锋利地反弹到人类自己的颈项之上。

我们要痛定思痛，要亡羊补牢。此刻大疫当前，我们要千方百计抗疫，咬紧牙渡过难关，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